

泾川古阮国溯源

□ 何小东 魏海峰

古国的诞生

——黄帝血脉，皋陶遗泽

阮氏源流扎根于华夏文明悠远厚重的历史根脉。依据《通志·氏族略》等传世姓氏典籍及地方谱牒研究考证，阮姓血脉源头可上溯至人文初祖黄帝。黄帝后人皋陶，活跃于尧舜禹时代，身居理官一职，掌管天下刑狱律法，是我国古代司法文明的开山先贤，因生于偃地，被黄帝赐为“偃”姓。

商王武丁年间，大约公元前1200年，皋陶的一支后裔因拓土戍边受封，向西迁徙。他带领部落落脚在泾河、汭河的交汇地带；此处水土丰润、沃土连片，农耕与畜牧皆可兴盛。部落于此修筑城邑，正式建立阮国。自此，名为阮的方国载入上古历史。

往后百余年间阮国于史料之中鲜少记载，直至商末，密须国发兵进犯阮国。《诗经·大雅·皇矣》有载：“密人不恭，敢距大邦。侵阮徂共，王赫斯怒。”记述了密须国恃强骄横，发兵侵扰北边的阮国。此事惊动西伯姬昌，也就是日后的周文王。

周文王决意出兵，既有匡扶道义的理由，更深藏长远的战略考量。彼时密须是殷商驻守西土的关键附庸国，也是周部族覆灭商王朝路上的一大阻碍。密须进犯阮国，恰好给周文王出师征讨一个正当理由。之后周军一举击溃密须国，夹缝之中的阮国自此臣服于周，国君地位有所下降，归入周人的管辖疆域。

故国消亡，但香火未曾断绝。一部分阮国子民四散迁居各地，余下多数族人留守故土世代繁衍。原先的王族后人便以故国名号为氏，形成阮氏，后世逐步演变为阮姓。至此，“阮”从一处方国地名，演变为承载阮国印记的血缘符号，融进庞大的中华姓氏谱系当中。

周朝立国之后推行分封制度，用来管控疆土，安抚旧部诸侯。阮国旧地地理位置重要，具备极高的战略价值，因此阮国王室后裔再度受封，以大夫的身份镇守泾河上游，这一方国势力大致延续至西周晚期。

文化遗产

——散落在平凉大地的阮国文物

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，在灵台县白草坡发掘了一批西周早期墓葬，其中2号墓中出土十余件青铜礼器，铭文释读为“(卩爱)伯作宝尊彝”。有地方学者考证认为，“卩爱”或为古“阮”字异写，推测墓主有可能是西周阮伯。

墓中出土数量众多、品类丰富的兵器，远超一般西周贵族墓葬，反映墓主兼具贵族与军事统帅的身份。白草坡地处要冲，控扼通往周都镐京之咽喉，亦为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必经之路。有学者推测，卩爱伯戍守于此，主要用以应对强悍的鬼方部落。

墓中出土的一件人头盔青铜戟，刺锋顶端铸有深目高鼻、卷须纹面的头像，具有明显的印欧人种特征。学者对此有不同推测，有观点认为，这件兵器或是纪念对阵鬼方斩获敌酋之功所铸，也有看法认为是战场上缴获的异族兵器，它成为3000年前族群碰撞与边境征战的珍贵实物见证。

今日泾川，仍可见“阮”之印记。以共池遗址、圆嘴山遗址、算李坪遗址为代表的90余处商周时期不可移动文物，揭示着商周文化在泾川县分布的广度；而以商代兽面纹铜觚、商代双虺纹长内铜钺、西周蝉纹铜鼎、西周饕餮纹铜鬲、西周饕餮纹铜甗和西周“母乙”饕餮纹铜爵为代表的商周时期出土文物，揭示着泾川县商周文化的深度。这些留存在泾川县境内的商周文化遗存，丰富了陇东地区商周历史的实物资料，为研究西周方国制度、族群迁徙提供了重要实证。

阮国都城所在地——泾川县城关镇水泉寺村，这里留存有共池、阮陵等相关遗址。共池在清代便是“泾州八景”之“共池涌碧”，是文献记载中与阮、共古国密切相关的地面历史标识。附近的“盘顶子”夯土台，台基高大，夯土层清晰，周围遍布商周文化

在甘肃东部的泾川大地上，泾河与汭河交汇、奔流。放眼望去，黄土地上梁茆沟壑纵横，地貌虽显平凡，却承载着一段被《诗经》传唱、被青铜器铭记的历史。

3000多年前，一个名为“阮”的古国在此生根。它虽未成就显赫王朝，却在史籍的缝隙中，以农耕、兵戈与祭祀，在文明的边缘写下了自己的留存痕迹。后来，古国虽消逝于历史长河，却留下了一个延绵至今的姓氏——阮，以及散布在这片土地上的遗址、器物与地名。



西周“母乙”饕餮纹铜爵



西周蝉纹铜鼎



商代兽面纹铜觚



商代“亚”徽铜鬲

青铜密码

——古阮国的生存图景

灵台白草坡与泾川出土的青铜器，为今人探寻古阮国的社会生活面貌，提供了重要的实物参照。

结合陇东地区的农业背景推测，阮国人以农耕为本，主要种植黍、稷，辅以麦、豆、麻，构成北方旱作五谷基础。粮食丰裕之后，一部分被用以酿酒。白草坡二号墓出土鼎、甗、簋、尊、觚、爵、盃、卣等成套酒食青铜礼器，不仅用来盛放祭祀的肉食饭羹，更是权力与等级的直观象征，无声宣示着墓主人的高贵身份，维系着社会礼制。

阮国有掌握核心技艺的工匠，青铜匠以范铸法制作礼器。同一批工匠，也铸造着决定国家命运的兵器。墓中出土的戈、戟、钺、成束的铜镞，都来自相同的工艺，却有截然不同的用途。

除了青铜匠，还有玉工在磨制温润的玉石，制成玉鱼、玉蝉等佩饰；加工海贝，制成货币用于交换。有木工运用青铜斧、斨、凿，制造战车与器具；甚至可能有漆工，制作那些镶嵌着蚌泡的华丽漆木器。

车马坑中四马一车的战车，是战场上的机动堡垒。它的制造集中了木工、皮革工和青铜匠的技艺结晶。手工业的高度分化与专业化，是古阮国能够同时维持礼制生活与军事机器的技术保障。车马坑的四匹马遗骸、青铜提梁直上的牛头、羊头纹饰，则表明以马、牛、羊为主的畜牧业已经非常发达。

畜牧业中核心的战略资产是马。墓葬旁单独埋葬的四匹骏马与战车，以及墓中出土的成套马轡饰，无不表明阮国贵族对马匹的精细管理和掌控。因此，阮国的经济根基，是由“五谷”农田与“六畜”牧场共同夯实的，它们共同养活了当地百姓，支撑了礼制，也奠定了军力的基础。

军事是阮国生存的支柱。阮国地处周王朝与西北部族之间的缓冲地带，战事频繁。白草坡2号墓出土的器物，如小型军械库——下层工具兵器、中层戈矛战车、上层礼器酒盃，正是古阮国命运的隐喻：一切文化与秩序，扎根于生产与生存斗争之中。

后人星布

——从建安文胆到四海为家

公元前771年，犬戎攻破镐京，周平王东迁洛邑，周王室对陇东地区的管控趋于瓦解。失去周王朝的庇护，阮国难以存续，部分阮氏族人随之向东迁徙。

汉晋时期，南迁阮姓中的一支定居在陈留郡（今河南省开封市陈留镇），形成望族。三国时期，阮瑀位列“建安七子”，其子阮籍为“竹林七贤”领袖，开创玄言诗风。阮籍侄子阮咸善音律，他改良的古琵琶，后世便以“阮咸”为名。陈留阮氏人才迭出，成为中原颇具影响力的文化世族，也铸就阮姓的精神标识。

西晋永嘉之乱（公元311年），中原士族大规模南渡。阮孚、阮裕等陈留阮氏族人，迁居江苏南京、浙江绍兴一带，另有支系远徙广西合浦。唐末五代，陈留后裔阮安出任福建邵武教谕，迁居绥安，被后世尊为阮氏入闽始祖。

明清两代，阮姓随人口移民浪潮进一步向各地扩散。明初，山西阮姓族人迁往山东、河南；清初，山东阮氏“闯关东”，落脚东北大地。早在秦汉时期，已有阮氏支脉向南播迁，进入今越南北部生息繁衍。19世纪初，当地建立起越南最后一个封建王朝——阮朝（公元1802年—1945年）。

阮国的历史，映照出上古方国格局更迭、周革殷命时代巨变，也藏着中华文明“家国同构”、代代赓续的文化密码。古国虽逝，“阮”这个名字，却借着宗族血脉得到延续。

从黄帝血脉到皋陶遗泽，从泾水河畔的上古方国，到《诗经》留下的历史印记；从以国为氏的姓氏起源，到魏晋名士的林下风骨；从阮伯戍守边地，到清代阮元治学著述；从中原散居到四海播迁，再到城外建立王朝，一部阮姓发展史，正是微缩的中华文明交融传播史。

今天，当你走进泾川，俯身触摸这里的泥土，或许能感受到三千年前粟粒的温度；静心聆听掠过泾汭河畔的风，亦可想象当年祭祀之音与戈矛回响。从商周时期的阮陵、共池，这片土地如同一部无字书，它是源自黄土深处的根脉，正渐渐汇聚为一座连接古今、沟通中外的文化长桥。

▽ 泾川县县城全景图（泾川县委宣传部供图）

